

8 Chinese Frontier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大学中文教材与教改应该如何“拓疆”
——由一套“选本”引发的思考

说“鸟”

可靠、准确、好用、实用：古籍整理的当代尺度
——评中华书局《通俗编》（附《直语补证》）点校本

朝鲜文人对王维诗风的接受

莎剧经典动画改编：趋势与启迪

康德—黑格尔美学遗产与王元骧的探索

姜亮夫先生年谱

中文学学术前沿

第八辑

《中文学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Chinese Frontier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中文学术前沿

第八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文学术前沿. 第8辑 /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308-14919-8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社会科学—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8631 号

中文学术前沿(第八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359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919-8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元明汉语工作坊



第三届汉语历史词汇与语义演变学术研讨会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学 术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骧 严家炎 吴元迈 吴熊和 裘锡圭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德华 方一新 池昌海 孙敏强 苏宏斌

李咏吟 吴 笛 吴秀明 汪维辉 张德明

周明初 胡可先 姚晓雷 徐 岱 徐 亮

黄 健 黄 擎 黄笑山 盘 剑 楼含松

主 编:汪维辉

副 主 编:黄笑山 胡可先 吴 笛

本辑执行主编:黄笑山

第五届韩汉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3.8 杭州



第五届韩汉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合影

目 录

大学教材与学术

大学中文教材与教改应该如何“拓疆”

- 由一套“选本”引发的思考 吴秀明(1)

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 说“鸟” 黄树先(6)
苏林、韦昭《汉书》“音义”考辨 万献初(14)
重释“三省”的“三” 杨 军 陈 挚(21)
试论汉语语音史的历史方音研究 刘晓南(28)
谈《旧杂譬喻经》在佛教汉语发展史上的定位 (日)松江崇(44)

古籍整理和编辑出版

可靠、准确、好用、实用:古籍整理的当代尺度

- 评中华书局《通俗编》(附《直语补证》)点校本 汪少华(54)
清代文献整理出版的回顾与前瞻 陈东辉(59)
《方言调查字表》勘误 申屠婷婷(72)

古典文学研究

- 朝鲜文人对王维诗风的接受 (韩)金昌庆(76)
《长恨歌》在日本的受容 文艳蓉(85)
唐诗与井:一个诗歌名物意象的个案考察 胡凌燕(92)
日本近代“诗史”观论析 高 平(99)

域外视野

- 莎剧经典动画改编:趋势与启迪 吴斯佳(111)
从惠特曼的影响看塞克斯顿的“自我” 张逸旻(116)

两头燃烧的蜡烛

- 论爱德娜·圣文森特·米蕾的抒情诗 樊维娜(123)

美学人生

- 康德—黑格尔美学遗产与王元骧的探索 李咏吟(134)

现实关注·人文情怀·反思意识

- 论王元骧先生近年来文学理论研究的三种品格 朱首献(144)

熔古铸今、守中致远

- 论王元骧先生近期美学与文艺理论创新之路 梁 慧(152)

学术大师档案

- 姜亮夫先生年谱 林家骊(162)

- 姜亮夫研究文献目录 王军兰 陈东辉(195)

大学中文教材与教改应该如何“拓疆”

——由一套“选本”引发的思考*

吴秀明

内容提要:大学专业化的中文教材尤其是研究型教材,为满足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和创新性中文人才培养的需要,也为了替其将来继续深造和可持续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有必要将诗学范畴拓疆到诗、史兼备的开阔领域,倡导一种立体多维的思维理念。反映在“选本”编选上,就是同时向“文学作品”与“文献史料”开放,充分发挥文献史料的功能价值。这不仅有助于学生读好、读懂与读深经典作品,同时也可借此强化他们的根源性学养,培养他们的研究意识和学术兴趣。

关键词:中文教材;思维“拓疆”;选本功能;史料价值

假如将迄今为止种类繁多的中国语言文学“选本”进行分类,我以为大体可分为非专业与专业两种类型。前者,主要针对非中文专业的学生而言,也包括社会上的一般语言文学爱好者,它侧重于作品的诗学价值;后者,则主要针对中文专业的学生而言,它除了诗学价值外,还要兼及史学价值。浙江大学中文系近期推出的这套涵盖文艺学、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5个二级学科、总计12卷的《中国语言文学作品与史料选》系列教材就属于后者,它带有专业化特点和“拓疆”性质,其初衷是为他们提供诗、史兼备,并与现行的“通史”(语言史、文学史)教材相配套的一套“选本”,以满足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和创新性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这也是中文核心主干课程的主要教材。按时下的类型划分,不妨称之为研究型教材。

众所周知,现有的中文专业学生使用的“选本”尽管在选择的标准、内容、形态、方式等方面各具特色,存在着不少差异,但在基本范式和总体思路上彼此却表现出某种惊人的同构性:那就是选文的对象和范围都锁定在文学作品上,它向我们呈现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当然也是美轮美奂的经典之作。所谓的“选本”,其实就是“文学作品选”,它也只向“文学作品”开放,其所内含的“诗学”指向是非常明确的。文学作品作为特定历史阶段文学创作的表征和载体,它凝聚了时代思想艺术的精华,对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尤其是近些年因诸多原因导致的审美贫乏症,在往往只记住概念、名词而对作品整体美、内在美不知为何物的情况下,更是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也因这个缘故,我对近些年来各高校一改旧观而普遍重视经典作品的教学理念表示理解和赞赏,并认为将来还有继续强化之必要。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仅仅是中文教育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它也不能包办和取代其他。实践表明,作为一个传统基础系科,中文教育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各个专业彼此间的办学目标、层次、规格也不尽相同。特别是一些学术积累比较深厚、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办学水平比较高的系科,更是已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探索,这也是当下中国乃至海外中文教育的客观历史和现实。而对研究型教学来说,到底如何在读好、读懂与读深经典作品的同

* 本文系《中国语言文学作品与史料选》系列教材“总序”,发表时略有修改;该教材从2012年起由浙江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时强化学生的根源性学养,培育他们的良好的研究习惯与学风,为将来继续进行专业深造和可持续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一句话,到底如何拓宽学生的思维视野和知识结构,培养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这是当前中文教育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研究型教材的主旨所在。

我们编选的这套“选本”,就试图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它看似好像只是在“作品”之外增加了一些“史料”,但它却反映和体现了我们对教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理念上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强调客观呈现,注重历史还原

这里所说的呈现和还原,当然包括“选本”所选的文学作品在这方面的功能价值——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诚如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它的“书记官”的功能价值,使它在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毕肖酷似上往往达到连史家都叹服不已的程度;但主要还是指被我们特别引进的这些文献史料:如序跋、诗话、传记、碑文、笔记、书信等,现代以降的如社团、传媒、文件、讲话、批示、社论、纪要、评论等。这些形态各异的史料的编选,不仅有效地拓宽了原有“选本”的内涵和外延,使之在整体构成上产生了革命性的扩容,而且还以其物化的形式引领我们穿越时空隧道,返回到彼时彼地的那个时代的语境与场域,与“作品”形成了富有趣味的对话关系。史料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载体,它原本就是属于历史的,在它身上积淀丰富的历史信息;而文献史料作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一种史料是实物史料),它凭借语言文字同时兼具能指与所指的双重功能,在还原和营造历史尤其是历史现场感方面还有自己独到的优势。因此它特别适用于文学作品的历史解读,历来备受重视,成为自古至今人们解读文学作品的重要参考和佐证。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品与史料是一对孪生体,它们彼此具有难以切割的血缘联系。如果说作品是悬浮在空中的一种空灵的感性存在,那么史料就是紧紧扎根在大地之上的一种具体切实的物态存在。也正因此,史料的有无、多少以及真实与否,史料意识的自觉与否以及实践运用的程度如何,不仅直接关涉和影响着具体作品的解读,而且也反映乃至决定着整体中文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中文教育的睿智与睿智的中文教育,都十分注意作品与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不是将它们彼此孤立割裂。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①,可以说是对此的精辟概括。他的《宋元戏曲考》以及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阿英的《晚清小说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姜亮夫的《楚辞通故》、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等作,都可以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典范。在他们那里,史料经过发掘、勘误、订正、转化、处理,不仅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成为还原历史、破译作品奥秘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许多长期以来的语言文学之“司芬克斯之谜”,也因之得到了合理解释。

北大中文系温儒敏教授有感于“专业阅读”存在的经典作品与当代读者之间的“历史隔膜”,在十多年前曾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主张,叫“三步阅读法”,其中第二步为“设身处地”,就是借助和

^① 王国维在1925年的讲义《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有此材料,吾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此作了发挥,他将王国维治学方法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曰取地下之遗物与纸上之遗文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调动文学史及文化史知识,再融会自己的想象,努力“回到作品产生和传播的历史现场”。^① 我们之所以在“选本”中增加了史料,其实也就是借助于史料“设身处地”地“回到作品产生和传播的历史现场”。在这里,史料一方面可以很好地起到营造历史氛围的作用,这对因“历史隔膜”造成的各种主观随意或过度阐释无形之中形成一种防范和反弹;另一方面它也引导我们情不自禁地进入到特定的历史规定情境之中,以“了解之同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②,从而对作品作出更加精准到位也更合乎情理的解读。当然,重视史料之于还原历史以及参证和解读作品的功能,绝非意味它可以取代对作品的艺术分析,用所谓的“史学价值”来代替“诗学价值”,那同样是不可取的。在“作品与史料”,或者说在“文学与史料”的关系问题上,我还是比较赞赏一位年轻学者的这样一种说法:“勇敢地跨出樊篱,而更丰富地回返自身”。^③ 这可能更合适、更接近温儒敏所说的“专业阅读”,也更符合中国语言文学的属性和趣味。

二、倡导研究意识,培养学术兴趣

这也是研究型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主要体现在选文以及选文的注解上,也体现在对史料的选择上。在这些地方,本“选本”努力倡导研究意识,体现研究理念:一方面用研究的眼光进行选与注,在选什么、怎样选的问题上体现史家的眼光,学者的思维和素养,使之超越庸常而具有一定的学术含量;另一方面调动和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从选文、注解特别是从史料那里切入探寻问题,进行必要当然也是初步的学术训练。这里所谓的研究,就史料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向度:(一)立足史料,以史料为基点向社会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政治学、心理学辐射出去,广泛地涉及彼时彼地的“社会关系总和”,从那里寻找质疑和问题的“点”,在“拓疆”的反观中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新的认知;当然也包括新发现或新引进的地下新史料、域外新史料,以此为基点研究问题,不仅可以开拓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且还能进而演化为一个“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语)。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四大文献史料甲骨文、敦煌遗书、居延竹简、大内档案发现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的重大影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二)通过史料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彼此之间潜在的矛盾、抵牾和裂缝,从中思考、质疑和发现新的问题,形成问题意识。如南朝梁顾野王所撰《玉篇》中的“今上以为”一词条,以往的一些语言研究者往往将“今上”解读为当时的“梁武帝”,认为这是顾野王在引用梁武帝的看法,借以说明当时对异体字的重视。而最近有学者在对《玉篇》残卷全面校勘和语词及书写分析的基础上,对此作出了全然不同的正确解读——原来此处的“今上以为”实际是“今亦以为”的讹误。^④ 于是最终证否了抄本里唯一的“今上以为”与“梁武帝的看法”有关的猜想。大量事实表明,中国语言文学中的很多问题往往都源于史料,正是对这些本源性的史料的精心收集、整理和研究,特别是对这些史料与作品裂缝的敏锐发现、质疑和把握,人们才从习见的话题中翻出新意。这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浙大中文系不少优秀学生学位论文或学年论文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吧。像2005届一位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论明初诗僧姚广孝及其诗文》,就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在编写《姚广孝年谱》的基础上将其置于元末明初风云变幻的语境下进行考察,令人信服

① 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9页。

②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9页。

③ 参见金理、杨庆祥、黄平:《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者三人谈》,《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

④ 姚永铭:《可疑的“今上”——〈原本玉篇残卷〉校读札记一则》,《汉语与汉语教学研究》第2期,日本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东京东方书店2011年版。

地作出了自己的结论。该文后以《诗僧姚广孝简论》为题刊发于《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研究意识培养的重要和必要。

当然,文学研究是很复杂的,它的如何进入和展开因人而异,有不同的范式和路径,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一个“选本”,它对学生研究意识的培养主要是引导,而不是刚性的指令,且在本科阶段不可操之过急,对学生提出不切实际的太高要求。但无论如何,强调研究意识的培养,强调对本源性史料尊重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强调必要的学术训练,对学生来讲不仅都十分必要,而且须臾不可或缺。可能是受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影响,也与现行的体制有关,中文教育长期以来重“思想阐释”而轻“史料考据”。尤其是“三古”(即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以外一些新兴或比较新兴学科以及相关课程,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更突出,也更严重。这就使中文教育尤其是某些作品的解读无形之中被空壳化了,它似乎变成了某种“思想”的简单符号或工具而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这种“思想”在以前是政治学、社会学的,它也被强行纳入政治学、社会学视域中进行解读;现在则被纳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视域中进行解读,从观念、思维到概念、术语完全是西式的。一切都效法西方,以是否符合刚引进的西方某某主义为取舍标准,而很少顾及作品的“历史语境”和自身的实际情况,更没有很好地考虑与中国固有、迄今仍然富有价值的传统思维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对接。这样的解读貌似时尚,实则用虚蹈空洞的所谓“思想”(准确地说是“西方思想”)代替具体而微的艺术分析。这样一种不及物的研究,它往往不可避免地对作品进行粗暴图解和肢解,显然是不可能真正发现美、洞察美的。为什么现在不少中文系学生对经典作品反应比较冷漠,感受不到其中妙处,先入为主地用某种所谓的“思想”去套作品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需要指出,在时代整体学术风气的影响下,中文教育重“思想阐释”而轻“史料考据”的现象在最近一些年程度不同地有所改正。在文艺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那里,开始出现了由单一的“思想阐释”向“思想阐释”与“史料考据”的双向互融的方向发展。这是很可喜的,它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出现了重大的“战略转移”。但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西学在中国的强势存在,也由于学术浮躁风的盛行,上述现象还没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据说前几年有人在做“重返80年代”研究时去采访韩少功,曾把新时期的一次重要的文学自觉运动“寻根文学”,说成是因为政治“压力之后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弄得韩少功很郁闷很生气。^①这里之所出现这样的误读,主要原因在于它不是从“事实”(“史料”)而是从“思想”出发进行。陈寅恪先生在1936年曾批评“今日中国,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识见很好而论断错误,即因所根据之材料不足”。^②陈氏所说的“学”指史料,“术”指方法。旧人只有材料而没有好的方法,失之僵滞,固然难有所为,但新人不依据材料简单套用外国理论进行研究也同样不可取。陈氏的批评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突出教学性质,明确教材定位

这一点在开头就已作了明确定位,并且在前面也多少有所涉及。落实到编选上,就是突出和强调中国语言文学历时演变的规律和特点,通过其发展流程的客观呈现,与“通史”教材的配套对接,形成彼此互动互补的关系。这不仅在作品选择上打破原有单一的“语言文学经典”取舍标准,而是采用“语言文学经典”与“语言文学史经典”双线兼容的编选原则。这样,一些当年曾产生重要

① 参见《文学批评的语境与伦理——第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

② 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7页。

影响而思想艺术诸方面存在明显欠缺或不足的作品就被我们纳入了视野。如刘心武的《班主任》，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在艺术上当然不免粗糙，还明显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但从当代中国语言文学史的角度看，却是无法完全绕开的一个代表作。史料也同样如此，为体现历时演变的规律和特点，既注重与文学史的发展流程吻合，特别选取对于文学史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经典史料”，也关注具有原创价值的新出土和域外新传入的“新史料”。如“古代文学卷”中的唐代文学骈文部分，就恰当地利用了大诗人王之涣墓志、韦应物墓志，与边塞诗人岑参密切相关的新疆吐鲁番出土的“马料账”，还有日本正仓院的《王勃诗序》中所收的《滕王阁序》等。这与以前同类教材中的“作品汇评”和“资料长编”式完全不同。现有的中文“选本”往往大同小异而内涵又比较紧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教学，也不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结构。我们这样做，其意是想选择这样一种“文史互证”、“双线兼容”的新的范式，更好地反映中国语言文学丰富复杂的存在和发展，与“通史”教材对接；同时也为教师和学生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掘，留下足够的空间。

总之，在选什么、怎样选问题上，包括内容、体例、篇幅，也包括作品与史料以及彼此内在关系和逻辑关联等，都与“通史”教育乃至整个中文教育大系统联系起来予以通盘考虑，服从并服务于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按照教材编写规律和原则办事。也就是说，一方面要考虑“选本”自身的独立性、新颖性和完整性，努力构建适合专业教育需要的一种新的范式；另一方面又要考虑与“通史”教育相连接，成为“通史”很好的配套教材。也只有与“通史”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虑，“选本”所选的有关“作品与史料”才能被有效地激活，充分凸显其意义和价值。从中文教育和教材编写的角度看，“选本”与“通史”应该是相辅相成，它们分则各自成章，合则融合无间，是一个既独立又统一的有机的整体。

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具体到各学科、各分卷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如语言文字学与文艺学，作品与史料往往就联结在一起，很难区分和切割。就说是文学吧，彼此的差异也颇大。如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其作品与史料具有较强的经典性、恒定性；它们所选的作品，往往既是“文学经典”又是“文学史经典”，是两个“经典”的合一。而在现当代文学那里，作品与史料则表现出明显的非经典性（或泛经典性）、不稳定性，其所谓的“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经常是分离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只能称之为“文学史经典”而很难说是“文学经典”。这里有学科方面的原因，也与它们彼此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语境有关。这无疑给我们编选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中国语言文学原本就是一个无限丰富复杂的浩瀚世界，为了尊重并还原呈现这种原生态，以满足研究型教学和人才培养之需，我们采取求同存异的原则，即在保持全书基本统一的前提下，尽量尊重各学科的特点和各分卷主编的个性。

浙大中文系从1920年之江大学国文系“源头”算起，迄今已有近百年历史。与海内外诸多兄弟院系一样，浙大中文系目前既面临良好的发展际遇，又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拐点”上，如何在继承传统、教书育人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培养具有较深厚基础和较强创造精神的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人才，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也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我们这次推出的这套由集体合作编写的“选本”，就是冀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研究型教学和教材编写是近些年议论较多的话题，也是不少同行感兴趣而又众说纷纭的一个话题。作为一个传统老系，我们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也很希望听到来自各方面的声音，以期将此项工作做得更好。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说“鸟”

黄树先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们依据斯瓦迪士的百词表整理汉语核心词,工作流程是先整理汉语材料,包括文献材料和现代方言,然后跟亲属语言比较,以期探讨汉语核心词的早期面貌,梳理其演变轨迹;在语义方面,我们引用类型学方法,进行跨语言语义比较,旨在总结语义演变的模式。本文照此整理汉语“鸟”。

关键词:核心词;比较词义;鸟;音义

“鸟”是汉语里最神秘的词,读音变化也很奇怪。人类自然语言,多拿鸟来代之男性生殖器,这一语义发展,对汉语“鸟”语义场产生很大影响。

一、“鸟”字的早期面貌

【鸟】* tuuwʔ// * ntuwʔ,《说文》:“鸟,长尾禽总名。”

【雕】* tuuw// * ktiw,《说文》:“雕,鹞也。”

“鸟”字,都了切,端母,现在读 n-。一般认为是避讳造成的。蒋礼鸿先生说,“鸟”,骂人的话,读入端纽,和《水浒传》里的“鸟人”、“鸟男女”的“鸟”相同^①。其他学者多有讨论。避讳说是有根据的。现在很多语言,鸟指男性生殖器,参见拙著《比较词义探索》^②。

包拟古却有不同看法:藏语 mchil(* m-thyil)“小鸟”。汉语“鸟”* ntil:, ntiw:/tieu:, 官话 niao³。“鸟”的官话读音本来应是 tiao³,以 n-代替原来的 t-,有人解释是为了避免跟一个褒词同音。比较简单的解释是,藏缅语的鼻音前缀同化作词根声母,以后复辅音 nt-再简化作 n-。这个假设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官话的读音就是比较古老的,因为它所保存的鼻音前缀在其他方言中已经消失了^③。包拟古的看法也值得重视。不过藏文的 mchil(* m-thyil)对应汉语的“佳”为宜。

吴安其先生认为汉语“鸟”* tug < * k-lug。藏缅语底布拉语(Tipura)“鸟”tok,“鸡”tog。吐龙语(Thulung)“鸡”grök-pu^④。

“鸟”字可比较藏缅语:

普沃语和斯戈语 tho“鸟”,参见博多-加罗语 * daw(加罗语 do,迪马萨语 dau)^⑤。

泰语 nok⁸ < * nl/r-“鸟”,比较汉语“鸟”。“鸟”字声母从 t-变 n-,大约开始于元代。但侗台语、

①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补定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

② 黄树先:《比较词义探索》,巴蜀书社2012年版。

③ 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潘悟云、冯蒸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6页。

④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⑤ 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1984年版,第157页。

苗语“鸟”字声母都是 n-, 所以汉语上古音“鸟”字的声母是什么, 还是一个疑问。不过汉语声母 * t- 和台语声母 * nl-/r-, * hn-, * n-, * r- 是可以对应的^①。单周尧《“鸟”字古音试论》对邢文提出不同的意见^②。

二、“弋”系列

“弋”系列可能是一个庞大的系列, 我们把“弋”系列分为三个小的系列。

1. “弋”小系列

【弋】lug// * k-lu^hk, 《大戴礼记·夏小正》: “十二月, 鸣弋。弋也者, 禽也。”“弋”也可以特指燕子。

【𪗇】* qriid, * qrid, 《说文》: “乙, 玄鸟也。齐鲁谓之乙, 取其鸣自呼。象形。𪗇, 乙或从鸟。”“𪗇”从“乙” * qrig 得声。

“弋”是鸟, 动词是射鸟, 字作“雉”, 《说文》: “雉, 缴射飞鸟也。从隹, 弋声。”字或径作“弋”, 《玉篇》: “雉, 今作弋。”王力先生说, 在缴射的意义上, “弋雉”实同一词。“雉”是后起的形声字^③。“弋”字本义是鸟, 词义发展模式同“鱼渔”。

【雉】* l'i^h// * g-li^h, 野鸡。郑张尚方先生说: “雉”从“矢” * hli^h 声, 对应缅文 rac < rik, 也应为 * rli^h (比照标准敏瑶语 gli^h、浪速语 khjik, 以及白保罗所举斯戈语、普沃语 khli^h、加罗语 grik, 也有可能为 * gl'i^h)^④。

“弋”系列是汉语一个古老的词, 它可以跟藏缅语以下词进行比较:

藏缅语词根的声母 r 由普沃语和斯戈语的 γ 来表示: 普沃语和斯戈语 tho-yi^h “雉”(tho “鸟”), 藏缅语 * s-rik ~ * s-ryak^⑤。

克钦语 u-ri < * rik “野鸡”(u “鸟”), 缅语 rats “野鸡”, 加罗语 grik “野鸡”, do-grik “黑野鸡”(do “鸟”), 卢舍依语 va-hrit “黑野鸡”(va “鸟”), 但是藏语是 sreg-pa, 西部藏语是 s'rag-pa “野鸡”, 列普查语是 khəryak fo “野鸡”(fo “鸟”)。藏缅语 * s-rik ~ * s-ryak^⑥。

克伦语-γi^h > * -rik “雉”, 代替藏缅语 * s-rik ~ * s-ryak^⑦。

汉语 d'io^h/ d'iek “翟”(野鸡), 也许还有 d'io^h/ d'i “雉”, 藏缅语 * s-rik ~ * s-ryak^⑧。

原始汉藏语 * (s-)re · k, 上古/中古汉语 [l]io^h/d'iek, 藏文 sre^hk, 列普查语 hryak, 克钦语 ri^h, 缅文 rats, 卢舍依语 hrit, 加罗语 rik^⑨。

白保罗拿汉语的“翟” * l'ewG// * k-lewk 跟藏缅语进行比较, 最好的比较应该包括“弋”字。

汉语的同源异形词是“鹄”, 元音有变化。

【鹄】* g · raag, 《尔雅·释鸟》: “鹄, 鸟鹄。”注: “水鸟也, 似鵠而短颈, 腹翅紫白, 背上绿色, 江东呼为鸟鹄。”据《纂文》(《太平御览》九二五卷引), “鹄”是一种野鸭。

① 邢公畹:《汉台语比较手册》,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第 154 页。

② 单周尧:《“鸟”字古音试论》,《中国语文》1992 年第 4 期。

③ 王力:《同源字典》,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第 258 页。

④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148 页。

⑤ 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 乐赛月、罗美珍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1984 年版, 第 145 页。

⑥ 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 乐赛月、罗美珍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1984 年版, 第 403 页。

⑦ 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 乐赛月、罗美珍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1984 年版, 第 380 页。

⑧ 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 乐赛月、罗美珍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1984 年版, 第 458 页。

⑨ 白保罗:《再论汉藏语》, 乐赛月、罗美珍译,《汉藏语言概论》附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1984 年版, 第 448 页。

【雒】* g · raag,《说文》:“雒,鸛鷖也。”即鸛鷖,一种小鸛。

【鹭】* raags,《说文》:“鹭,白鹭也。”

“鸛”* k · raak 比较缅文 krak⁴“鸡”^①。柯蔚南拿藏文 glag“鹰,鹭”跟汉语“雒”、“鹭”比较^②。

“鸡”是常见家禽,所以可以作为鸟类的通名。比较亲属语言以下形式:

缅语 krak“野禽”,参见马鲁语 rɔ < * rak,拉祜语 γáʔ,还有卢舍依语 va-rak“鸭”,来自藏缅语 * rak^③。

2. “鸛”小系列

【鸛】* ŋaa,《说文》:“鸛,鸛鸟也。”段注:“此今之鸛字。”通作“鸛”,《汉书·邹阳传》:“鸛鸟累百,不如一鸛。”

【鸛】* ŋgleeg,《春秋》僖公十六年:“六鸛退飞过宋都。”注:“水鸟。”

【鸛】* mogs,《说文》:“鸛,舒鳧也。”雒雀,见《集韵·遇韵》。字或作“鸛”,《广雅·释鸟》:“鸛,雒也。”亡遇切。

梁敏、张均如先生把侗台语“鸟”拟作 * mrok^④,可以跟汉语这个系列比较。

“鸛”小系列,可以跟下列亲属语言进行比较:

拉珈语“鸟”mlok⁷ 属原形,侗语 mok⁸,武鸣壮语 rok⁸,泰语和水语则是 nok⁸,对应汉语的“鸛”mog,印尼语是 manuk^⑤。

“鸟”,印尼语 manuk,对应原始侗台语 * mlok。汉语同源词为“鸛”(从“矛” * mru 得声)muk < * mlok^⑥。

“鸛”系列,还可以和藏缅语 * m-ŋak 比较:

“鸟”,缅文 hŋak,阿昌语 mɔʔ³⁵,原始藏缅语 * m-ŋak^⑦。

原始苗语 * nuŋ^c,布努语 * naŋ⁶,巴哼语 taŋ¹ noŋ⁶,勉语 no⁸。原始苗瑶语 * m-nok^⑧。

3. “鸛”小系列

【鸛】* ruwGs, * gruw, * mgluw, * mruw < mgr-,云雀,《尔雅·释鸟》:“鸛,天鷖。”又:“雒之暮子为鸛。”此谓小野鸡,也指小鸡,郭注:“今呼少鸡为鸛。”还可指鸭卵,《集韵·尤韵》:“鸛,鸛卵也。”这两个意思有密切的关联,参见拙著《比较词义探索》^⑨。

【鸛】* ruwGs// * g-r ūwks,《说文》:“鸛,鸟之大雒也。一曰雒之莫子为鸛。”“鸛”、“鸛”应该是同一个字,“鸟”、“佳”偏旁可以互通。

从语音上看,“鸛”系列跟“鸛”系列可能有联系。

【鸛】* gloowG,《说文》:“鸛,鸣九皋,声闻于天。”

① 黄树先:《汉缅语比较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3 页。

② 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潘悟云、冯燕译,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69 页。

③ 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1984 年版,第 301 页。

④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⑤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3 页。

⑥ 潘悟云:《对华澳语系的若干支持材料》,《著名语言学家自选集·潘悟云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3 页。

⑦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6 页。

⑧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8 页。

⑨ 黄树先:《比较词义探索》,巴蜀书社 2012 年版。

三、“鸡”系列

“鸡”系列可能跟上面这个大的系列有某种关联,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观察。

【鸡】* kee,《说文》:“鸡,知时畜也。”籀文作“雞”。帕默尔曾说,如果一个农民说他的 birds lay well,我们不假思索就知道他的 birds 是指 fowls(鸡)。这种类型的变化是极其频繁的^①。汉语“鸡”可对对应亲属语言的鸟字。鸡是人们很早就驯化的家禽。在汉语里,一些野鸡的叫法,跟“鸡”相同。

【雉】《说文》:“雉,鸟也。”章移切。司马相如《上林赋》“过雉鹄”,高步瀛义疏:“史、汉鹄作雉。”

【鸪】* kji,《说文》:“鸪,暝鸪也。”段注:“《广韵》曰:小青雀也。按《广韵》盖谓即窃脂。”《玉篇》:“鸪,鸟鷖未生毛。”指幼鸟。旨夷、脂利切。

【鹭】* qi,《说文》:“鹭,鳬属。”段注谓此字来自青黑色。待考。

汉语“鸡”对应亲属语言的下列字词:

“鸡”* kee,缅甸语 kje³“鸟类的总称”。《说文》:“鸡,知时畜也。”^②

“鸡”,傣雅 kai⁵,西双版纳 kai⁵,德宏 kai⁵,泰语 kai⁵ < * k-。比较汉语“鸡”^③。

四、“鸪”系列

【鸪】鸪 * ku// * kūw,《说文》:“鸪,鸪鹑也。”

【舊】* g^wus// * gūs,《说文》:“舊,雉舊,舊留也。从萑,臼声。”

汉语“鸪”可以跟亲属语言比较:

克钦语 khru,缅甸语 khruⁱ~khyuⁱ,拉祜语 gu,加罗语 kru,卡米语 məkhru,安加米那加语 mekru“野鸪”,卢舍依语 ʰu-mi“鸽子”,ʰu-rou“野鸪”。藏缅语 * khruw^④。

汉语 gⁱug“舊”(鸪鹑),藏缅语 * gu,克钦语 u-khu(u是“鸟”),缅甸语 khu(Tin 记的塔沃扬方言,1933 年),傈僳语 gu,拉克尔语 va-ku(va是“鸟”),米基尔语 iqhu < iqkhu“猫头鹰”,唐吐语 wa“鸟”,藏缅语 * wa^⑤。

汉语 k iōg“鸪”,藏缅语 * kuw,米基尔语是 pəkü,缅甸语是 khui,梅特黑语是 khu-nu,卡米语是 iqmākhu“鸽子”(缅甸语的 khruⁱ和卡米语的 məkhru“斑鸪”对应)^⑥。

汉语“鸪”系列跟侗台语有如下联系:

汉语 * ɕkjəgw“鸪”:泰语 khau¹ < * khr-“鸽子”:藏文 fiangu“鸽子”^⑦。

“鸽子”,傣雅 ka¹kje¹,西双版纳 ka¹ke¹,德宏 ka⁶ke¹,khau¹ < * khr-。泰语 khau¹与汉语“鸪”有关,傣语都是象声词,但原始声母和声调与泰语相同。比较汉语“鸪”^⑧。

①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李荣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68 页。

② 黄树先:《汉缅语比较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邢公畹:《汉台语比较手册》,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435 页。

④ 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1984 年版,第 118 页。

⑤ 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1984 年版,第 177 页。

⑥ 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1984 年版,第 177 页。

⑦ 邢公畹:《汉台语舌根音声母字深层对应例证》,载《邢公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524 页。《汉台语比较手册》,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118、147 页。

⑧ 邢公畹:《汉台语比较手册》,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147 页。